

新中華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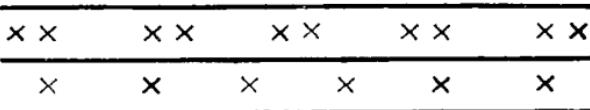
社會科學彙刊

中國經濟恐慌與經濟改造

章乃器等著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33  
C19



新中華叢書

社會科學彙刊之一

中國經濟恐慌與經濟改造

章乃器等著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印刷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發行

學社會刊 中國經濟恐慌與經濟改造（全一冊）

◎ 定價銀三角五分  
(外埠另加郵匯費)

著者 章乃器等

有不著准作翻權印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埠中華書局

## 序

近年來的事實，證明中國經濟——工業、農業、金融業——已沉溺於恐慌的深淵了，在恐慌的深淵裏掙扎的我們，自然要設法救濟或者進一步的主張改造，希望跳出恐慌的深淵。

如果這種恐慌不是從天外飛來，而是我國經濟有機體內的「病症」那麼，我們在開「藥方」以前，首先應該把這種病症弄清楚，這就是說，必須用一番「臨床診斷」的工夫。其次，關於藥方，一方面固然要「治標」，另一方面尤其要「治本」。

這本小冊子——中國經濟恐慌與經濟改造——雖說祇七篇短文章，然對於中國目前尙未擺脫的「病症」却加了全面的考察，就所開的「藥方」而言，也是於「治標」（救濟）之外，注意「治本」（改造）。我們相信祇有「標本兼治」才可望「藥到病除」。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

編者

# 中國經濟恐慌與經濟改造 目錄

## 序

中國經濟恐慌之觀察.....	李紫翔(一)
中國農業恐慌的特殊性.....	胡伊默(二九)
中國金融業之危機及其救濟方案.....	尤保耕(四五)
銀價提高與中國貨幣政策.....	培悌(六三)
市面恐慌及其救濟問題.....	培悌(八二)
中國統制經濟之檢討.....	達生(九一)
改造中國經濟的正路與歧路.....	章乃器(一一)

# 中國經濟恐慌與經濟改造

中國經濟恐慌之觀察

李紫翔

## 一 緒言

中國經濟是構成現代資本帝國主義世界經濟之重要的和最密切的一環。一方面，中國整個的國民經濟悠久地被破壞和被統制於帝國主義者之手，另一方面，各帝國主義間經濟的矛盾和衝突，最集中並最尖銳的表現於中國，所以，中國經濟近百年來之被破壞和被「再組織的非常」態的發展——半殖民地化經濟的發展，帝國主義的影響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所謂中國國民經濟，實際上已不是一個獨立的完整的體系，帝國主義的經濟不僅是居於外在的，同時又是中國經濟之內在的一個決定的地位了。

一九三一年爆發的急性經濟恐慌，是受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特別是帝國主義者轉嫁經濟恐慌的負擔於中國勞苦人民的肩上，起了重大的作用。不過，我們如果要完全的

澈底的認識中國經濟恐慌的性質，認識半殖民地的經濟恐慌的特徵，必須究明近百年來中國經濟的發展過程；因為現階段的經濟恐慌，實是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內在矛盾之發展的必然產物。帝國主義者在這次世界經濟恐慌中「以鄰爲壑」的外來影響，雖然特別嚴重，但不過是促成和加深這一半殖民地經濟恐慌罷了。

## 二 經濟恐慌的性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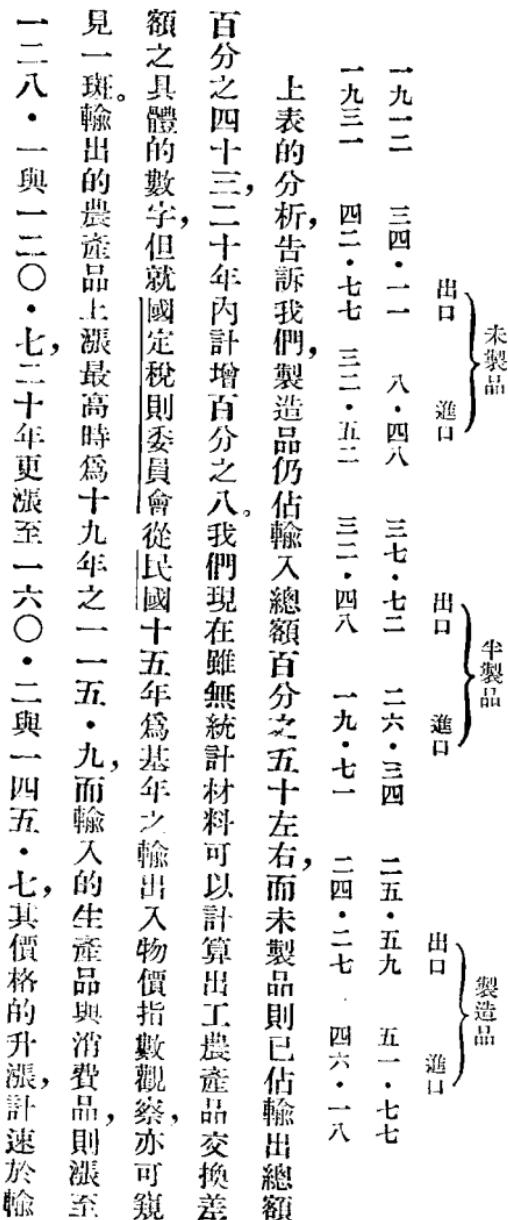
我們要檢討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以及經濟恐慌的原因，首先必須說明中國經濟之主要基礎的工農手工業，近百年來長處在慢性的經濟恐慌之過程中。某些少數新式經濟部門之畸形的發達，常常是站在帝國主義者在華經濟利益的從屬與容許之下，與立於工農手工業不斷的恐慌基礎之上的。所以在這次急性的恐慌之前，中國經濟不曾有過一般的繁榮；而恐慌由農業部門爆發出來，其範圍包括了全國農村，一切農業部門，以至一切產業部門，決不是偶然的。在這裏，我們試將從半殖民地的慢性的經濟恐慌之基礎上爆發出來的急性恐慌之原因分析一下：

## 第一，中國農村之重要副業——家庭手工業，自從五口通商以來，幾完全爲資本帝國主義

的機製品所消滅，這自然給農村經濟以重大的打擊。但是帝國主義者經濟侵略所造成的中國經濟之慢性恐慌，是由於舊的生產部門漸次破壞，新的生產方式不能產生。在被破壞的生產部門中，最主要的要算爲中國國民經濟之基礎的農業。農業的長期破壞，我們可以從外國工業品和中國農產品交換價格之剪刀式的差額和長期的國際貿易之入超上得到一種概括的認識。

帝國主義者攫取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商品市場，原料市場和資本市場的目的，無非爲獲得額外利潤。因此，帝國主義者必須獨占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國際貿易機關和商品市場，推銷其工業品，以至過剩的農產品，和購買必要的原料。帝國主義者在華工廠的建立，亦不過利用廉價勞動力和原料，減輕流通過程上的死費用，以及避免某種關稅的負擔，而增加商品在市場的競爭力和獲得更大之利潤。這樣一來，使中國農民，一方面，成爲帝國主義的商品購買者，另一方面，又成爲國際市場的原料栽培者。可是原料與製成品的交換，帝國主義者必須用各種方法造成輸入與輸出之巨大的差額。這一差額，就表現在自一八七七年以來長期的入超上，並且工業品價格的升漲較速於農產品，其低落又較緩於農產品，所以更形成工農產品之剪刀式的價格差。又因輸

入輸出的經營，完全壟斷於各帝國主義者的出入口洋行和其卵翼下的買辦式「行幫」之手，一方面既故意提高工業品的市價，另一方面又特別壓低農產品的市價。在這種商品流通過程上，特殊的買辦商業資本又從中搾取利潤，自然更擴大了工農產品的價格差。這裏，我們引證幾個事實以資證明：中國的進口貨物，是以工業製造品為最多，反之，出口貨物以原料和半製品佔大部分，最近二十年來進出口商品性質之分析，依然沒有變更這種趨勢。（註二）



出的農產品達百分之四十以上。反之，下落時，如今年四月農產品跌至六六·三，而生產品與消費品則尙保持一四八·七與一三〇·三之指數。是則農產品價格的下落，又比輸入的製造品要速一倍以至一倍半了。假如我們能將中外通商以來，每年數萬萬元以至二十餘萬萬元輸出入貿易的總值中，把價格差的損失計算出來，其數字，一定是驚人的。至於歷年貿易入超的數值，除去那些鴉片、嗎啡、酒類、軍械、火藥及「從後門」私運的祕密國際貿易的入超，和祕密輸去的金銀等無法統計外，僅就海關公佈的數字計，已近一百萬萬元。外債本息及外人在華直接投資所得的利潤至少又有五十四萬六千七百萬元。（註二）帝國主義者搾取去的金錢，雖是全中國的損失，但最後必轉爲農村之負擔。因此，中國的農村，一方面，既永久的持續着入超；一方面，又受工農產品交換價格差的損失。農村的現金不得不流入通商口岸，最後更流至帝國主義者的國家。這些流出的資金，既脫離了「再生產」的過程，同時，中國整個農村就愈受封建地主、高利貸和商業資本之剝削。那怕農產品的大部分已經商品化，而帝國主義和封建的剝削，終於阻塞了中國農業生產方式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這一切就形成中國農業之慢性恐慌的過程。

第二，帝國主義者搾取殖民地的過程，同時限制了中國產業資本之蓄積與發展。固然，我們

不應抹煞某一工廠或某一個產業部門，在某一時機中，暫時的發展的事實；不過我們的意思是說，在整個民族工業一般的發展趨勢上，已經指出中國的產業資本在現有條件之下，只有走向破產或者轉變為帝國主義者的企業的前途。比如鐵礦開採權的百分之八十二，鐵礦及生鐵生產的百分之九十五，石油生產的百分之九十八，均被擇在日帝國主義者手裏；煤炭和電力產量的百分之六十，亦落到外人掌握；（註三）即如民族工業之花的紡織業亦充滿了失敗、改組、出賣等慘酷的史實。本來，廣大的產業預備軍，低廉的勞動力，冗長的工時，以至批發莊制的小工業和家庭手工業之廣大的存在，均給中國民族資本家與外貨競爭的優良條件。不過，這些條件終因缺乏經濟政治的壁壘，又為帝國主義在華工廠所共同享用。最進步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技術和半農奴的勞動力的結合，給了帝國主義者以獲得額外利潤的可能。茲引日本富士紡織公司常務理事鹿村美久氏去年所統計的各國精紡四十支紗的工資比較表，以資證明：

	每人每週工資	每千錠的人數	每千錠每週生產量	每包中的工資	工資的百分比
在華日廠	三・七元	八・九人	二・八包	一一・八元	一〇〇・〇
日本	五・八	六・一	二・七	一三・二	一一一・九
印度	五・五	一五・〇	二・四	三四・四	二九一・五

這一世界最低的工資率，雖亦同爲華商紗廠所享有，但因受政治的金融的和技術的條件之限制，終不能與帝國主義者在華工廠競爭。況且帝國主義者容許殖民地輕工業的發展，是以銷售其半製品，特別是要以中國一般人民購買力足以消納其過剩商品爲條件的。僅從人口與土地的比率上觀察，中國自然是現世界尙待開發之市場，不過事實上中國一般人民的購買力，在帝國主義與封建的壓榨之下，不僅在相對的低落，並且還在絕對的縮小之中。於是帝國主義者，不得不以政治的經濟的壓制或以傾銷的武器，壓潰華商企業，而保持和擴大其過剩商品的銷場。中國煤鐵工業的失敗，華商紗廠不斷在蕭條與衰落中的掙扎，以及某有名的化學製品公司，必與卜內門公司締結銷售協定，才能樹立基礎，都是帝國主義者排擠民族工業的證明。另一方面，華商工廠在利用低廉的勞動力，和實施合理化的結果，已在抵補帝國主義侵略所受的損失上，獲得相當的成功。上海華商紗廠十支紗的生產率，一九一八年爲一·五磅，一九二九年爲二·二磅，增加百分之一四七；十四支紗由一·一磅而至一·五磅，增加百分之一三六。(註四)不過，從加緊榨取勞動者來與帝國主義者「和平競爭」，又不免減低人民的購買力和引起勞

動者的反抗。這些矛盾的發展，便決定了華商工業繁榮的內容，只是腐朽的；華商工業的發展，只是動搖的；而華商工業的衰落與破產，或者轉入帝國主義者之手，却終爲注定的命運。

此外，我們從中國國際收支，財政收支不敷的增加上，亦可間接證明中國國民經濟之一般的慢性恐慌。首先從國際收支平衡之差額的增加說起。（單位百萬元）

	一九〇二——一九一三平均	一九一四——一九三〇平均
	數 額	指 數
商品輸入	六三一·三	一〇〇·〇〇
金銀淨輸入	二·五	一〇〇·〇〇
政府債務	八九·二	一〇〇·〇〇
外人直接投資	七九二·三	一〇〇·〇〇
合計	一五〇·〇	一〇〇·〇〇
商品輸出	四八五·二	一〇〇·〇〇
華僑匯款	六一·〇	一〇〇·〇〇
政府債務	五二·八	一〇〇·〇〇
外人直接投資	七四九·〇	一〇〇·〇〇
合計	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收支不敷之差額	四三·三	一九五·九

上表是美人李麥氏（G. F. Remer）對於中國國際收支平衡的分析，自一九〇二至一

九三〇年中，各收支項目之變化，均不能反映中國經濟有若干改善的情形。輸出商品指數之增加略高於輸入者，係因李麥氏對輸出的數值加入陸路無記載輸出及輸出估計過低之數字，而對私運和秘密輸入之數值則又付缺如。至於政府借款與還本付息的減少，亦不足為收支狀況進步的說明，因為一由於中國政府可為借款擔保的財源，和可資開發的實業，大都早為帝國主義者囊括淨盡。二則政治借款雖然減少，而帝國主義者直接投資則已增加；這種投資方式的改變，實指示中國半殖民地化一天深似一天。並且實際上收支之差額由四三·三百萬元，增至一九五·九百萬元，已加百分之四五二·四二，可為中國國民經濟慢性恐慌的速度指標之一。或者有些庸俗的學者以為把在華外國海陸軍隊、使領館、教會及慈善事業及游客消耗等所謂小項目的收入計算進去，則收支不敷之差額，可以大大減少，甚至收支竟可以平衡；然而所謂小項目的各種收入之性質，不過表示帝國主義政治的、武力的和文化的侵略費用之增加，除了更加促進中國經濟恐慌外，是不會產生什麼好結果的。總之中國國際收支差額之增加，已成為中國經濟的「常態」，這不明明是慢性經濟恐慌之反映吧！

其次，財政以經濟為基礎，已為世人所公認。所以根據一國財政狀況之善惡，即為測知一國

經濟情形之標準。中國財政機關，收支既缺確實的預算，詳細的決算更不公開。加以地方政治，猶存割據，無論屬於中央政府之統治與否，地方財政，中央政府無從詳知，甚至無權過問。因此，所謂中央政府之收支，實際上常限於權力可及的地方，而不足代表全國的情況。下面是就可能搜集到的材料數字，預算、概算、報告和估計等列成一表，以示自光緒以來之所謂中央政府的歲出歲入之概況：

年	別	歲	入	歲	出	盈	虧	附
光緒七年		三、五九、一九兩	庚、七、四五兩十	四、二七、吉六	自元年至二十年約借外債四、〇〇〇、〇〇〇兩以上			
光緒二十年		三、五三、四四兩	八、五五、五〇兩	七、七、四〇	借華款二、〇一〇、〇〇〇兩			
光緒二十六年		三、五三、四四兩	八、五五、五〇兩	七、七、四〇	匯豐款三、〇〇〇、〇〇〇乙未以來約借債一、三〇、〇〇〇兩			
光緒三十二年		一、六、六〇兩	三、五、〇五、〇〇兩	一、六、七、七、四〇	匯豐款三、〇〇〇、〇〇〇乙未以來約借債一、三〇、〇〇〇兩			
光緒三十四年		三、四、三〇、〇〇兩	三、五、一〇、〇〇兩	一、三、三〇、〇〇	借外債一、〇〇〇、〇〇〇磅			
宣統三年		三、五、一九、九九兩	三、五、一、三七、二五兩	一、八、八、三五、三六				
民國二年		三、三、六六、一六元	四、七、八七、一五元	一、八、一、〇五、六〇	舉債收入三、三〇、〇〇〇元			
民國三年		三、四、四〇、一五元	三、九、一三、一五元	一、八、一、三五、三七	舉債收入四、三五千元			
民國四年		三、三、六六、一六元	三、五、一五、一六元	一、八、一、三五、三七	內債收入八、三五千元			
民國五年		三、三、六六、一六元	三、五、一五、一六元	一、八、一、三五、三七	內債收入八、三五千元			
民國八年		四、五、七六元	四、五、一七、八八元	一、五、三、三、〇三	內債收入八、三五千元實際不敷約充千萬元			

民國十四年	一、一三、五、七、九、三、七	發行內債 三、〇〇〇千元
民國十六年	一、一三、五、七、九、三、七	發行內債 八、〇九〇千元
民國十七年	一、一三、五、七、九、三、七	發行內債 二、〇〇〇千元
民國十八年	一、一三、五、九、九、九、九	發行內債 一、〇〇〇千元
民國十九年	一、一三、五、九、九、九、九	發行內債 一、〇〇〇千元
民國二十年	一、一三、五、九、九、九、九	發行內債 一、〇〇〇千元
民國二十一年	一、一三、五、九、九、九、九	發行內債 一、〇〇〇千元
民國二十二年	一、一三、五、九、九、九、九	發行內債 一、〇〇〇千元
民國二十三年	一、一三、五、九、九、九、九	發行內債 一、〇〇〇千元

關於上表之歲出入的數字，大都不盡與事實相符；不過這裏可以認識兩點：第一，中央政府的歲出入，雖然因其統治範圍之忽大忽小，致在數字上表現陡增陡減之現象，但是一般的說來，歲出入之膨脹的趨勢，是非常明白的；這種歲出入的膨脹百分之九十九可以說是用於與生產事業無關之軍政費和債務費的支出，而於經濟的慢性恐慌上，無疑的是起了甚大的反作用。第二，在歲出歲入之數字的比較上，似乎有幾年是有少數的盈餘或收支適合的，然而實際上恰好相反，我們祇要檢視附註內每年所舉的內外債數字，即知其收支不敷之數，所以就現有的材料觀察，我們至少可以說自光緒年間一直到現在，歷年的歲出都是超過歲入，而且不敷數是一年

年增大的，如光緒年間每年不敷數尙不過二三千萬兩，而現在已增至二三萬萬元，約增十倍左右。這種歷年增加的收支不敷的財政恐慌，一方面應視為促進國民經濟慢性恐慌的要因之一，另一方面又可視為國民經濟慢性恐慌的結果在財政上反映出來。

由以上各方面的論證，均可看出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在帝國主義者侵略，與封建殘餘勢力束縛之下，中國國民經濟，特別是農業手工業陷於一種不可挽救的慢性恐慌之慘境。同時，在固有的生產組織之不斷破壞的條件上，培植起來的通商口岸的新式企業——帝國主義者在華的工商業，買辦制度的商業與金融，以及所謂民族工業；後者雖不免大都帶了某種的買辦性，但較之前二者的與帝國主義者的沆瀣一氣，終竟不免要徘徊在「繁榮」與「衰落」、「獨立」與「附庸」的歧路。所以，此次急性的經濟恐慌的爆發，固然受了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之嚴重的影響，特別是帝國主義者之恐慌挽救運動中轉嫁負擔於半殖民地的影響。但是無疑的實是中國經濟之慢性恐慌的必然結果，換句話說，這次急性的恐慌是爆發於慢性恐慌的基礎之上的。只有這樣，才能正確的瞭解此次恐慌的真實原因、範圍和深度，以及它的嚴重意義。